

侗台语民族、百越及南岛语民族关系刍论

潘 汁

【摘要】长期以来对侗台语民族的研究大多是零散的, 主要以其中的某一个民族为研究对象, 很少有从整体上来研究侗台语民族, 特别是从它与百越、南岛语族之间的关系层面来研究。据研究, 从中国东南沿海到中南半岛, 南至东南亚诸岛, 东方延至太平洋环形岛链的广阔地区, 历史上曾存在着广泛的联系。而侗台语民族则是这块辐射状的链环中的重要部分。侗台语民族不但是百越的重要成员, 而且是百越的最直接的继承者。揭示侗台语民族的历史与现状, 对于探求侗台语民族与周边民族的历史关系以及内部诸支系的形成与分化, 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侗台语民族; 南岛语民族; 百越

【作者】 潘汁, 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社会学学院 04 级硕士研究生。南宁, 530006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54X (2005) 04-0131-010

A Preliminary Com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Kam-Tai Family, Baiyue and Austronesian Family

Pan Zhi

Abstract: Since long ago researches on Kam-Tai family are scattered. They only take certain ethnic as their research object and researches on Kam-Tai family as a whole are rarely found, least to say researches from the aspec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iyue and Austronesian family.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there have been widespread contacts between places from southeast coast in China to Indo-China peninsula, extending to islands of Southeast Asia in the south and broad area of ring-like island chain of the Pacific in the east in history. The Kam-Tai family then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adiate shaped chain. The Kam-Tai family is not only a member of Baiyue family but also the first heir of Baiyue family. So the discovery of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Kam-Tai famil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on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Kam-Tai family and the surrounding nationalities and the forming and splitting of its branches.

Key words: Kam-Tai family; Austronesian family; Baiyue

一、侗台语民族的概念及内涵

“侗台语民族”之概念是基于语言学角度提出来的。国外称为 Kadai, Dai-Kadai, Kam-Tai 或 Daic。这里的“台”和台湾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 Tai 或者 Thai 的译音。此提法由李方桂先生首先提出, 他从语言学的角度创造了“台语”“侗台语”两个概念。所谓侗台语民族, 是指有着相同的历史渊源和语言文化的多个民族的集团, 国外称为 Dai-Kadai, Kam-Tai 或 Daic。中文的叫法也不统一, 如侗台、壮泰、傣泰或卡岱, 甚至有的叫做岱台、傣掸等等。近年来, 随着侗台语民族

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壮学的发展,这些概念有逐渐统一的趋势。一般来说,国内的侗台语民族叫做壮侗语民族,国外的则仍然称为侗台语民族。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民族的名称与相关的语言学分类的名称并不是完全对应,语言学谱系的分类是比较明确的,而民族名称则比较模糊。

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表明,从中国南方的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广东等省区,到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国家,甚至远至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的广大地区,分布着几十个彼此之间有着广泛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的民族,即侗台语民族集团,总人口将近一亿。上述民族在中国境内的有八个,分别是壮、侗、傣、布依、毛南、水、仡佬、黎族,中国以外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及印度东北的阿萨姆邦等地,它们是越南的泰、佬、卢、岱、侬、山斋、热依、拉哈、布标、布那、都依、水、宋族^①,老挝的老龙族(笼统的称呼,其中有三十多个支系),泰国的泰佬卢等三十多个泰语的民族,缅甸的掸族、印度东北部阿萨姆等邦的阿洪、坎低、曼人等七个民族,在柬埔寨和马来西亚也有少量的侗台语民族。

二、侗台语民族研究回顾

侗台语民族开始受到西方世界的关注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十九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先后征服了印度和东南亚,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开始研究东南亚各国及中国南方各省的历史、地理、民族、语言、习俗等问题,继而觊觎中国大陆,所以西方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开始把研究的范围扩展到我国的西南各省,为日后的军事入侵和殖民统治作准备。最早对侗台语民族做出详细描述的是西方的一些传教士、旅行家。1885年英国传教士柯奎翁(A·R·Colquhoun)完成了从我国广东出发,往西到达缅甸的曼德勒的考察之后,发表了《在掸族中》(Amongst The Shans)一书,书中他把在所经过的地方所见过的人民都称为泰族。同时,伦敦大学教授拉古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为该书所写的导言《掸族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Shan Race)也成了目前所见的研究侗台语民族的最早论著。1897年法国人邦德里(Pierre Lefevre Pontalis)在荷兰发表的《泰族侵入印度支那考》(L' invasion Thaie Indochine),德国人奥托·埃勒斯1901年在柏林发表的《骑马游印度支那》(On Horseback Through Indochina),英国人戴维斯(H·R·Davis)1909年在英国剑桥出版的《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tze),美国人杜德(W·Clifton Dodd)1923年在美国衣俄华出版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The Tai Race, 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英国人吴迪(W·A·R·Wood)1926年在伦敦出版的《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这些都是西方对侗台语民族进行研究的主要著作。另外侗台语也引起一些西方的语言学家的关注,康拉迪(A. Conrady),马伯乐(H. Maspero),沃尔福(K. Wulff)和谢菲尔(R. Shafer)等人都曾经对侗台语进行描述,并探讨侗台语在语言学上的系属问题。

泰国有“暹罗历史之父”之称的丹隆亲王在1925年出版的《暹罗古代史》里基本沿袭了此前西方国家对侗台语民族的研究观点,在探讨泰族的起源时也述及到我国的广西等地的壮族。此书和作者的观点曾经在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产生长期的影响。

这一时期西方对侗台语民族的基本特点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描述,把所有相关的侗台语民族都归为“泰族”,认为他们只是泰族的支系。而且还有些人出于某种目的对侗台语民族(即他们著作中的“泰族”)的起源和分化作了种种今天看来很荒谬的推测。

在我国的史料中,很早就记载了我国和掸国(今之缅甸掸邦)、暹国的交往。《后汉书·和帝本纪》有这样的记载:“永元九年(公元97年)春四月,永昌徼外蛮及掸国重译奉贡。”《后汉书·顺帝本纪》:“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后来《元史》记载:“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十月万户何子志、千户皇甫杰使暹国。”“至元二十九年甲辰,广东宣慰司遣人以暹国主所上金册诣京师。”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文献中没有提及当时境外的这些国家或者民族与中国境内的相关民族之间的联系。而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对有些少数民族大都带着对蛮夷的鄙视心态,所以相关的文献材料都没有能够充分的进行描述和分析,值得提的

是，清朝官员、史学家赵翼曾在广西、云南、贵州等地任职，其《檐曝杂记》主要记述他在这些地方的所见所闻。他写道：“广东言语虽不可了了，但音异耳。至粤西边地，与安南相接之镇安、太平等府，如‘吃饭’曰‘紧考’、‘吃酒’曰‘紧老’、‘吃茶’曰‘紧伽’，不特音译异，其言语本异也。然自粤西至滇之西南徼外，大略相通。余在滇南各土司地，令随行之镇安人以乡语与樊人（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之一）问答，相通者竟十之六七。”^②这是至今为止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跨省、跨国的侗台语民族的描述。

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传入中国，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研究本国的包括侗台语民族在内的民族问题。他们从多学科、多方面入手来研究侗台语民族问题，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其中刘介（刘锡藩，代表作是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岭表纪蛮》）、徐松石（代表作是分别在1939年、194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粤族考》）和李方桂（代表作是《台语比较手册》、《龙州土语》等）的贡献最大。李方桂1937年在《中国年鉴》上发表了《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一文，首次使用了“侗台语”这个名称，构筑了侗台语族、苗瑶语族、和藏缅语族同属汉藏语系的理论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采取了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而后又进行了民族识别，对侗台语民族系统内的各个民族的研究也不断的深入，系统地研究侗台语民族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代表性的有李方桂、罗常培、邢公畹、罗美珍、倪大白、梁敏、张均如、陈保亚、李锦芳等人。这个时期的研究先是语言学，再到文化学。语言学的研究当中形成两个绝然不同的阵营。一个以邢公畹、郑张尚芳、潘悟云、张元生等为代表，支持李方桂将侗台语族和苗瑶语族以及藏缅语族一道列入了汉藏语系（印支语系）中，这个观点当时得到了大多数中外学者的赞同，长期以来成为了学术界的主流。另一阵营则是受到本尼迪克特（P. K. Benedict）的影响，质疑侗台语族属于汉藏语系的观点，代表性人物及著作的有罗美珍的《试论台语的族属问题》、倪大白《中国的壮侗语与南岛语》、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等等。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后一种观点受到了普遍重视，证据也是越来越多。随着后一种观点的研究不断深入，证据逐渐变得充分，这些看似纯粹的语言学的争论却引出一个无法回避的、更大的问题：侗台语与汉藏语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本尼迪克特所推想的“澳泰文化圈”是否成立？

三、南岛语族、“澳泰文化圈”和侗台语之间的关系

在以上述及的语言学之争的同时，侗台语与南岛语族之间的关系的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所谓的“南岛”（Austronesia），是由两个希腊文字的字根 *austro-* 与 *-nesia* 所合组而成，前者为南方之意，后者意指群岛，所以“*Austronesia*”可以翻译成“南岛”，*Austronesian* 即南岛语。这里的“南岛”（*Austronesia*）首先是个西方航海家的概念，南岛和南岛语系后来被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所采用。更加确切地说，“南岛语族”（*Austronesian*）等同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Malayo-Polynesian*）”，其范围指的是现在居住于我国台湾、中经东南亚、南至西南太平洋三大群岛，东起复活节岛、西到马达加斯加等海岛上的、具有民族语言亲缘关系和文化内涵的土著文化体系，主要包括马来人（一般包括台湾高山族）、密克罗尼西亚人、美拉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等几大族群，总人口达两亿五千多万，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民族文化体系^③。

林惠祥、凌纯声、徐松石等学界前辈们的研究结果说明，早期的中国学者已经将“百越”文化体系扩展作为南岛语族重要组成部分的马来民族。徐松石总结了东南亚语言的八大特点，从中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乃是东南亚各土著大民族，在血统上同属一家，即所谓的蒙古利亚种。第二乃是越寮泰掸缅马来印尼和菲律宾等民族，乃远古时自中亚细亚移来”^④。尽管徐氏的结论并不是很严密，还需要更多的其它学科的研究结果来加以证明，但仍有可取之处。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这个名称可以得知，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把南岛语族的起源地认为是在马来半岛，这就是所谓的南岛语族源于东南亚之说。另外在我国台湾，有些居心叵测的人持南岛语族台湾起源论，企图否认

台湾与大陆历史文化的相承脉络。但民族考古学的最新进展表明,“在中国南部地区,稻作社会和高度发展的新石器时代的技术特点,从大约公元前5000年以后就存在于扬子江以南的沿海地区。这些文化中的丰富稻谷证据必须加以强调,同样应该加以强调的,还有许多对海岛东南亚和大洋洲大批新石器时代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和人工制品的制作特点。这些特点包括红泥浆装饰陶器、弯曲的膝形石镞柄、无柄或有段石镞的使用,艺术风格强调螺旋形和圆形,以及猪、狗和鸡的家养等等。根据贝尔伍德(P. Bellwood)的结论,操南岛语的南岛民族是由亚洲大陆而来,可能与侗傣(Kam-Tai)民族或南亚(Austroasiatic)民族原是一家,分家后到台湾来,年代大约是6000年前。大约5000年前,才开始从台湾南下扩散到菲律宾群岛,主要是北部吕宋一带。然后到婆罗洲、印尼东部,时间大约是在4500年前。然后往东、西两方扩散,东至马里安那群岛(关岛、塞班岛一带),也到了南太平洋部分地区,往西到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时间约在3200年前。再下一步才扩散到中太平洋美拉尼西亚区域的加洛林群岛一带。然后往东到波里尼西亚去,时间约在公元300年左右。今天在新西兰的毛利族(Maori),则是最晚的移民,约在公元800年^⑤。童恩正在深入地对南中国与东南亚的中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后也认为,在晚更新世至早更新世时,在南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文化系列上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文化最紧密的地区,是中国的广西、贵州、广东、云南、江西、四川和东南亚大陆的北部。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此种相似性仍然可以被观察到^⑥。

本尼迪克特(P. K. Benedict)在1944年发表了《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一个新的联盟》,认为“汉语和台语之间的相似范围是有限的,这种相似不能支持通常认为这两种语言有发生学上的亲属关系。”另外她通过构拟出的原始南岛语系的一些基本词汇,如“田、湿田、园子、犁、水稻、甘蔗、牛、水牛、斧头、独木舟”等南岛语和现在仍然用于华南的侗台语有共同特征,从而判断:南岛语、侗台语是在新石器时代从华南沿海水稻耕作者的居住地开始向外扩展的^⑦。尽管本尼迪克特后来并未能够找出更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她自己试图构建的“澳泰文化圈”,但是在没有找到更充分的证据来反驳之前,她的观点是不能轻易被忽视的,同样也是难以彻底推翻的,这大概是许多人被本氏的见解所吸引和接受的原因吧。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本尼迪克特的观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不断遭受批评的同时也逐步地得到了来自学术界的支持。2002年李锦芳教授的《侗台语言与文化》是第一本系统研究探讨侗台语族系统内部以及外部的语言文化联系的专著,从另外一个角度支持了本尼迪克特的观点。另一位中国学者陈保亚在1996年发表了《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他找出两种不同语言中的两百个最稳定的,有音、义对应的关系词,然后根据从第一百个词到第二百个词的关系词数量的上升或下降,来区分这两种语言之间是同源关系抑或接触关系。他运用这种方法检验的结果,认为侗台语与南岛语的确有同源关系,但又与汉语有密切的接触关系,因此,汉语和侗台语的关系不是语言谱系的关系,而是语言联盟的关系^⑧。这是到目前为止有关侗台语系属问题的最新观点,也是对本尼迪克特观点的最直接、最有力的支持。与此同时,已经有人将本尼迪克特构筑的理论体系付诸于研究实践之中,有代表性的应该首推乔希姆·斯利辛格(Joachim Schliesinger),他把老挝境内的南岛语族、侗台语族和苗瑶语族统称为“澳泰语族”,其中他的一本书干脆就取名为《老挝民族卷三:澳泰语民族综述》^⑨。

综上所述,通过考古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结果表明,现今的南岛语族的区域范围与亚洲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中南半岛相连而形成的广袤地区,具有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相同或者相似、语言文化相联系的背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整个石器时代到文明时期的漫长时间里,以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华南一带为中心的居民逐渐向东南、西南方向迁移,逐渐辐射至整个南岛语族的范围,在时间、文化融合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今天的南岛语族的情况。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相对以华夏文明为代表的大陆文化而言,这一广袤区域曾经是个完整和独立文化圈(至于是否采用本尼迪克特命名的“澳泰文化圈”还是另外选定更合适的名称,还有待讨论),尽管它与北方大陆也有着长期和密切的交流。

那么 从地理位置来看 侗台语民族就是这个文化圈里发源地之一 更重要的是 作为百越集

团的成员特别是百越的直接继承者，它也应被视为这个广泛的文化圈的核心部分。

四、侗台语民族与百越

1. 侗台语民族形成的时间

作为澳泰文化圈（这里姑且沿用本尼迪克特的命名）在中国大陆的主要部分，侗台语民族的分布范围，从中国南方的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广东等省区，到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国家，甚至远至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其间有几十个彼此之间有着广泛的历史文化上的渊源关系的民族，总人口将近一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国家演化成不同的民族，表现出跨省、跨国的分布格局。这些民族的族源的主干可以上溯至中国远古时代的“百越”集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过迁徙、分化，再与周边的其他民族进行融合，逐渐形成了现在侗台语民族跨省、跨国而居的格局。侗台语民族中的泰族和老族分别在泰国、老挝两国成了主体民族，而在其它的国家，侗台语民族则成了所在国的少数民族。这个民族集团的发源地大致可推断在中国的广西全部、广东西部、湖南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以及越南北部这一区域内。在大概距今五千年时，也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百越”系统中的侗台语民族集团已经初步分化形成了壮泰、侗水和黎三个不同的群体。最先迁徙的是黎族从这个区域的东南往雷州半岛迁移，而后到达海南岛，而与此同时壮泰（今之傣、泰、掸、老、壮等）诸族内部已经分化，开始形成南、北壮语方言区：居住在广西中部和北部、贵州南部和云南东部偏北地区的壮语北方方言区，居住在广西南部地区和云南东部偏南地区的南方方言区。南方方言区的壮泰先民后来向西、向南迁徙，形成了侗台语民族在东南亚的分布格局。

侗台语民族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中国古代的百越集团，是百越系统内的西瓯和骆越两支发展而来。那么百越形成于何时？瓯骆又形成于何时呢？西瓯、骆越之名，见于秦汉时期。胡绍华先生在他的《中国南方民族发展史》中在对中国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进行探源时对“越人”及“骆越”是这样描述的：“中东南地区各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其历史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以前。中东南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根据考古证明，在我国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广东以及江西、湖南、广西等省区所出土的有段石铲和几何印纹陶等都具有共同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这就说明，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东南地区就有人类居住了”^①。这里特别以“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来说明这一地区人居民，那么这个时间就是这一地区的主要居民——“越人”的形成时间吗？或者是百越各成员的形成和分化的时间？王文光先生认为，越族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形成的。他在列举10个壮、布依、傣、侗、仫佬、水、毛南和黎族语言中与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词汇，发现发音相同或相似^②，但从地域上来看是不同的，空间距离相当大，这就说明了他们的共同远祖在形成之后，尚未分化之前，这些词汇就已经产生了，而共同语言的产生又是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的结果。王先生这一说法，是基于在中国南方地区的考古学发现而提出的。他的观点是百越大约在五千年前形成，侗台语民族由其百越主体发展而成，以后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分化、发展，在各阶段有不同的族称，最终在明清时期形成壮族。另一种与此不同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徐杰舜先生，他认为早在远古之时，百越作为南方的一支土著，就已经活跃在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及岭南一带了，从河姆渡文化开始，经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直到几何印纹陶文化，是百越从形成到分化的时间跨度，其中的一部分在历史长期的发展中经过多次的分化和聚合，逐步成为中国南方壮侗语族，另一部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溶合于华夏民族，或同化于汉族，成为汉族的支源之一^③。又例如在讲到壮族的起源时，他认为秦汉时期的瓯骆和骆越是其远祖，东汉及至隋唐的俚和僚及乌浒是直接族源。“在唐以后，在新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开始了形成为壮族的历史过程”^④。范宏贵先生则通过壮、傣、泰的语言文化及考古资料的研究，创造了“词汇出现年代法”，认为在汉代以前，即公元前二世纪以前，壮、傣、泰族还生活在一起，是一个人们共同体，其居住地在桂林一带，有一部分大约在春秋至汉代以前，即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

前二世纪的六百年间的某个时候,迁徙至今之西双版纳;至公元四世纪时壮族与傣族、泰族已经分化形成不同的民族^⑭。那么,从范先生的详细表述里我们再得出两个推断:一,汉代以前即公元前二世纪以前的壮、傣、泰族还生活在一起的一个人共同体,据现有史书,可断定为瓯骆族人;二,早在公元四世纪,壮族、傣族、泰族已经形成了各自的民族了(时间跨度约700年)。另外,还有人认为“百濮”即百越,为侗台语族诸民族先民,认为早在华夏民族形成以前的传说时代,距今约四五千年前,岭南越族就已经和中原地区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领袖尧帝、舜帝、禹帝之间有频繁的接触,在语言文化上彼此之间互相吸收与融合,同时越文化与楚文化也有密切的联系^⑮。梁庭望先生认为壮族先民(即尚未分化的侗台语民族)与古籍上提到的西瓯、骆越、仓吾、损子、桂国、句町、夜郎、濮、漏卧、毋敛等有关。“瓯”又作区、呕、西瓯,大约在夏代已经闻名中原,战国末期相当强大,成为部落联盟之首。而骆越部即鸟部落,是百越的本支,由于《逸周书·王会解》载有“路入大竹”(现有的多种民族史资料误为“人”),可见在商周时期已经名闻中原^⑯。梁敏、张均如在他们作了大量的侗台语族的语言文化研究后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概距今五千年前的时候,侗泰诸族^⑰的先民已经初步形成为壮泰、侗水和黎三个不同的民族集团。到了春秋、战国之际,临高人(临高人虽然在解放后经过民族识别后归为汉族,从语言学及民俗学、历史学的情况来看,学术界普遍将其列为侗台语民族之列)先民从广西东南部和雷州半岛一带迁往海南岛北部,黎族先民则逐渐往海南岛北部进入五指山区,壮、泰、侗诸族的先民和布依族的先民仍分别聚居在广东西部、广西、贵州南部和云南东部的不同地区。当时壮、泰诸族内部已经发生分化,操壮语北部方言的壮族先民和布依族的先民居住在广西中部、北部和贵州省的南部及云南省东部偏北地区;操壮语南部方言的壮族先民和傣、泰、老挝、掸的先民居住在广西南部 and 云南偏南的地区,侗、水诸族内部也已经分化^⑱。这是关于侗台语民族的形成时间的最早的推断,也是该集团分化时间的比较详细的推断。但同是研究侗台语民族的倪大白先生却有不同见解,认为百越乃是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分布在绵延数千里的东南亚大陆上的若干个有着共同族源的古代民族的总称^⑲。

这些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于时间上的推定:就百越而言,有人认为约一万年前的形成,也有的认为是五千年前,甚至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或者模糊地以“新石器时代”一言以蔽之;说到西瓯和骆越,有说是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也有认为是夏商时期;具体到这个集团内部的某一个民族,也有着很大的争议。比如说属于侗台语民族集团的壮族,对于其形成的时间,有说是明清两代,或唐朝以后,或公元4世纪时的魏晋时代,也有的只说壮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回避了壮族在各历史阶段形成的时间。

战国时期北方的中原人习惯把南方人叫做越人,有关越人的文字记载也是从那时以后才逐渐多了起来,但是所有的这些史料都是汉人用汉文字书写,记录他们所知道的关于南方越人的事情或者印象。越的种类繁多,有“百越”(百粤)之称,“百”谓其多,如春秋时期的“于越”(一说“干越”),战国时期的“扬越”,秦汉时期的“瓯越”、“东越”、“南越”、“闽越”、“骆越”“西瓯”和“滇越”,三国时期的“三越”等。越人的分布范围很广,东起台湾、江浙,南至两广,西至云南西南,在古代都有越人居住。百越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当时的民族或部落在数量上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难于确定的,他们所居住的地域也不能用今天的国家疆界那样来作精准地划分。越人经过长期的繁衍发展,有的同化于汉族或其他民族,有的几经发展,最后形成今天的侗台语民族等诸民族。如果以此来推断百越集团在五千年前左右形成、至战国、秦汉时期从百越中分化形成了西瓯和骆越、侗台语诸民族此后再分化和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推断显然与其它的重要考古发现不符。

约在9千年至一万年,桂林甑皮岩人就发明了陶器,有了原始农业,学会了驯养家猪,过上定居生活。“桂林甑皮岩文化遗址的年代在九千年以前”^⑳。在此更早之前,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广西百色盆地,共发现了86处古人的石器加工场,“这个遗址的年代距今有七十万(±500年)以上”^㉑。仅从这个例子里就可以得知这一地区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在活动。这些人是不是越人的祖先?在没有别的更有力的证据之前,不能排除这个可能,但是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广西柳江县通天岩

洞穴发现的“柳江人”头骨化石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为五万年，其体质形态与桂林甑皮岩人接近，同属南方蒙古人种，而蒙古人种南亚类型与现代壮人有着较明显的相似特征^②。也就是说这一地区的早期居民从体质与现代的壮侗语族相似，说明了从柳江人一甑皮岩人一现代侗台语民族有较为明显的相承性，这种相承性发生在前两者和后者之间，而不是和此外的别的什么人。

另外一个最能够代表越文化的考古发现是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是我国目前最早出现稻米和家畜驯养的遗址之一^③。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文化遗址的大量发现，已经暗示着与浙江河姆渡遗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很显然，在公元前五千年至公元前三千年之间，甚至是更早的时期，整个中国南部沿海地区都居住着使用陶器和耕作稻谷的居民，这些都是相当可信的^④。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桂林甑皮岩遗址还是浙江河姆渡遗址，就陶器的使用来说，一点也不比北方的中原地区所发现的晚。在北方中原地区发现有陶器的最早遗址是河南裴里岗遗址，其年代约在距今8000年以下^⑤。这就是否能够说明，就同一时期而言，以越（百越）为代表的南方文化与北方中原文化是一种平行而不交叉的关系呢？从自然地理环境上来看，中国南方属于亚热带和热带气候，阳光充足，雨水充沛，森林茂密，河网众多，既能提供水生动物为食物，又能提供舟楫之便，特别是众多的石灰岩溶洞，给旧石器时代以来的人们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之所。这样独特的生态环境，是决定着一地区古代文化面貌的最重要的条件^⑥。相同的自然环境促进了相同或相近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习俗的产生。自然环境的因素使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华南地区的远古人们（百越）共同带有以下相同的几个特点：一，图腾崇拜相同。早在河姆渡遗址的出土文物中就有鸟形象牙圆雕，而壮族的传世史诗《布洛陀》、《姆六甲》中说壮人就是鸟变来的，“洛”和“六”壮语就是鸟的意思。二，经济类型相同。从考古资料看，这些地区都有稻作农业的遗址发现，另外还发现了大量的贝丘遗址，与“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断发文身，以象鳞虫”的史料记载相符^⑦。三，建筑形式相同。早在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就有干栏式房屋，因南方潮湿多雨，至今仍可看见此类建筑。四，善舟之习相同，为了适应南方河流密布的自然环境，“越人善于用舟”^⑧。这与寒冷干燥的北方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石器时代，华南在文化上也同物质上一样，与毗邻的东南亚的关系，比它与寒冷干燥的华北的关系要密切得多。新近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的考古发现表明，华南文明的起源可能与考古普查更彻底、古物保存更完好的华北一样早甚至更早”^⑨。考古证明，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的史前文明并不比黄河流域起步晚，年代最古老的是云南元谋人化石，要比陕西蓝田人化石早一百万多年。到了新石器时代，上述地区的居民也懂得钻木取火，也会制作石器，掌握农耕技术，也挖穴筑屋，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出土的陶器饰纹更是丰富多彩，富于变化，工艺精巧。故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百越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即一万年后至四千年前形成，与中原的华夏族是相对独立的关系，就今天看来，它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分别自成一体地发展着。

“百越”之名，始见于《吕氏春秋·恃君篇》：“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引颜师古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又见《汉书·严助传》：“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这些记载只说明了“百越”所居的大概方位，但是对时间背景上并没有说明，相对于其内容来说，作者的年代背景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从甲骨文中的“戔”字得知，越作为一个与商朝有别的人们共同体的名称，已经见于汉文字逐渐成熟的商代，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越”作为群体只能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才形成，因为“越”作为实体应该在有文字记载它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不是两者同时进行，更不可能是在其之后。否则，那些数量众多、具有鲜明地区别于中原文化特点的在中国东南、华南和西南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又作何解释呢？应该说这里的“越”其实就是战国时期写成的《吕氏春秋·恃君篇》里所提到的“百越”。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即一万年后至四千年前，是百越民族形成的时期，只因为百越是个内部松散、彼此间的内在联系并不紧密的群体，没有出现过统一的局面，所以百越从产生形成时起，就是百越内部各支系的分化之时。同时，已经使用文字的中原地区也多次出现政权更迭，也是造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有关百越的史料记载的前后不一致的原因之一。

除了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之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对侗台语民族历史研究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黎族的先民在很早以前就率先从原居住地往雷州半岛迁移,后来再从大陆前往海南,由于当时的社会形态和生产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因此在语言中除了日、月、水、火、猪、狗、鸡、鸭、蚊子等最古老的语词与同语族诸语言相同较多之外,亲属称谓和农业、手工业等有关的语词还没有产生或者还没有大量产生,所以黎语这些语词大都与本语族其它语言不同,彼此的同源词只有百分之二三十。当时侗台语族的母语还没有声调,声调和量词是在黎族迁离大陆之后,黎语和壮、侗诸语言分别单独发展起来的。“故目前黎语的声调跟壮侗诸语言只有A调类相对应的较多A调相当于汉语的平声,本语族^①诸语言A调类的字都是最多的……语言发展的情况与社会发展的情况及考古方面的发现是大致相符合的”^②。这个研究结果很好的说明了黎族从大陆、从今天我们所称的侗台语族共同体中分化出去的时间,因为语言学的研究结果从这一地区的关于农业、手工业的考古发现得到了证实。另外范宏贵先生也从语言学研究入手,用大量的相同或相近词汇的起源来求证壮族、泰族、老族是从古代的同人们共同体了分化出来^③。这些例子还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在作民族历史探源时,要结合各方面的手段,力求将各个学科的研究综合起来,看看能不能发现其中的重合点,才有可能做到准确的判断。

到底古代越族人是不是和中原华夏族一开始就有了密切的接触并且互相影响呢?从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的现有资料来判断,答案是否定的。北方中原地区的华夏文化和南方越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应该是稍晚以后的事情,即周代至战国时期以后。那么为什么还有人认为这两者早在华夏民族形成之前的传说时代就已经有了密切的接触、甚至认为百越自始至终都在华夏族的影响之下呢?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根据现有的文字记载。多数专家都引用了以下这些文字记载,如《尚书·尧典》载:“申命羲叔,宅南交”;《礼记·少问篇》:“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史记·五帝本纪》中也有类似记载:“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使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史记·夏本纪》:“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这里提到的地名“交”有人认为就是今天南方相应的岭南越人居住区,而“会稽”就是百越的中心,由此他们断定早在五帝时代,中原文化已经深深地影响到南方越人。再者,《逸周书·王会解》载有“诸侯来献,或无马牛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事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浞深、九夷、十蛮、越沔、剪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革、之鬻、蛟盾、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玕、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自古之政,南人至众皆北向”;同篇还提到“路入大竹”、“仓吾翡翠”等与越地、越族之名。这些材料叙述了五帝时代及商初北方中原华夏族与南方交往以及南方越人向北方进贡的情况,但是这些文字材料并不是严密和不可辩驳的。因为这些文字材料是到了汉代以后才书写,此时距离所记载事件发生的时间已经很久远,可信度不高,而且其中多半也是口头相传的传说故事,就连以严谨著称的司马迁也用了“或言”这样的字眼,说明他自己也是道听途说得来的。另外,到了这时候,由于汉文化那显而易见的先进性,汉文化已逐渐成为文化的中心,恐怕连这些材料的作者们都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我为中心,余皆蛮荒”的观念,认为万般文明我为先,有意地中原华夏文华抬高到各种文化之上。因而这些材料只能作为诸多研究方法中的一种,而不能作为唯一的手段。从现有的考古发掘来看,也没有考古发现能有力地证明商周以前的中原文化同岭南越人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从史学资料来看,夏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但它的疆域却仅限于黄河中游的河、洛流域的黄土地带,到了商代,虽然国家疆土有了拓展,也仅仅是整个黄河流域至山东中西部,南不过从来没有超过长江流域;周朝也发祥于黄河流域,覆灭了商朝之后,东攻东夷和淮夷,南伐荆楚,《竹书纪年》及《吕氏春秋·音初》都可以看到这些记载^④。但是周王朝在频繁战争中战果有限,周宣帝时通过战争夺得的江汉流域很快又被楚人夺回。商代关于伐楚的记录可见于商朝武丁时期的卜辞中,《诗·商颂·殷武》有“奋伐荆楚,深入其阻”的记载^⑤。从中原的周朝到越,中间隔离着一个强大的连周朝都难以征服的荆楚,如果商周时期中原王朝要逾越荆楚,要南方越人特别是岭南越人

臣服、纳贡，这是难以想象的。反观楚国，西周时就广为分布在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的的两岸，同西周不断地发生战争。周昭王率师远征伐楚，“丧六师于汉”^⑧，连昭王本人也死于汉水之中。到了战国时期楚悼王用吴起为相，“南平百越”^⑨。真正征服南方的倒不是商周而是楚。百越文化之所以和中原华夏文化有某种程度的交往，起初并不是直接的，而是经过了楚。又因为楚长期与中原王朝直接地正面接触，彼此间相互影响较深。所以，如果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原华夏文化与百越文化的相互影响，应该是始于这个时期。至于大规模的进行，则是到秦朝统一岭南之后。除了对文字资料的谬读的原因之外，为什么还有人坚持认为早在华夏民族形成之前的传说时代就已经有了密切的接触、甚至认为百源自始至终都在华夏族的影响之下呢？恐怕是“汉文化中心论”的意识在作祟吧？

简言之，百越是一个宽泛的群体，它的形成与存在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百越的内部有广泛而松散的语言文化上的联系，它一开始就由各不互相统属的多个群体组成。百越又是发展的，如果将之视为一个动态中的群体的话，那么它的发展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沿着亚洲大陆的西南端，进而形成今之中南半岛的侗台语民族的分布格局；另一条线路则是向着南方的海洋进发，依次在众多的海岛上落地生根，并且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形成了前面所说的“澳泰文化圈”的海洋部分。而侗台语民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百越形成之初，其文化的发展起初与中原华夏文化是相对独立的，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是渐进式的，由疏散到密切。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侗台语民族有不同的汉语族称，但是其内部的主要支系如壮泰、侗水和黎三个民族集团大约在五千年前就已经形成，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这些民族集团内部在逐渐分化，形成今天的壮、侗、傣、布依、毛南、水、仡佬、黎族以及国外的侏、岱、泰、老、掸、阿洪等民族。

2 侗台语民族分化的时间和迁徙之路线

生存的需要是远古人类迁徙的主要原因。远古时期在今之中国大陆、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上，生活着三大民族集团：北边内陆的华夏民族、南边的孟——高棉民族以及夹在中间的百越民族。这三大民族集团都在不断地发展和壮大，但是他们的发展方向及发展结果都是不相同的，主要的原因在于受到了地理条件的限制。发祥于黄河流域的华夏集团，如果要向东方发展，就要面对浩瀚的海洋，这对于不善舟楫的华夏族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向北向西则是茫茫的沙漠或高原，对于并非游牧民族来说生存也是相当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向南发展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南方气候湿润，水网众多，各种飞禽走兽不计其数，易于人类生存。结果，这个民族集团首先从黄河流域向南出发，跨过长江，逐渐同化了长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各个越人支系。虽然最终未能同化瓯骆越人，但其影响力在岭南越人地区已不可忽视。原居于湄公河中下游与萨尔温江中下游之间的孟——高棉集团，向东、向西、向南的发展也都受到海洋限制，唯有向北发展的前景最好，结果，其势力不仅北上到红河流域，甚至影响曾到达五岭以南地区。原来栖息于长江、珠江、红河流域的百越集团，因受上述两大民族集团南北挤压，处于被动地位。他们往东，受制于海；往南，不仅发展潜力不大，而且还受制于孟——高棉集团；北面，面临着日益强大的华夏族的压力，最后只剩下五岭以南的西瓯骆越未被同化，但许多瓯骆越人陆续向西迁徙，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侗台语民族的分布格局。他们与周边民族的互动甚至内部的相互影响无时不在发生，所以说整个侗台语民族的分布格局一直是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

从侗台语民族最先分化出去的是黎语族和临高人，时间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五千多年前，他们从广西的东南和广东的西南的雷州半岛迁往海南岛北部，黎族先民则逐渐往海南岛北部进入五指山区。与此同时，壮、泰、侗诸族的先民和布依族的先民仍分别聚居在广东西部、广西、贵州南部和云南东部的不同地区，但其内部已经酝酿着分化，形成了两大方言区：壮语北部方言的壮族先民和布依族的先民居住在广西中部、北部和贵州省的南部及云南省东部偏北地区；操壮语南部方言的壮族先民和傣、泰、老挝、掸的先民居住在广西南部 and 云南偏南的地区；侗、水诸族内部也已经分化。^⑩之后的一次大规模的分化和迁徙发生在春秋至汉代，这个时间正是中原华夏族布及岭南的一个高峰，时间约在 2700 年前至 2100 年之间，共同生活在岭南和岭北侗台语民族先民之一支或数支向西迁移，到达今之云南西部的西双版纳以及云南南部的德宏、瑞丽一带，其后裔就是现在的傣

族^③。这次迁徙对于整个侗台语民族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在分布于中国境外的、中南半岛的诸多侗台语民族大多是从这一部分再分化、迁移出去的(另外一条线路是由广西西南部经越南北部进入老挝和泰国)。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就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广西、云南、泰国、缅甸东部和越南北部应该被认为是同一区域,彼此间大同小异。所以当我们看到中国汉代的史料中记载的我国和掸国(今之缅甸掸邦)、暹国的交往时,其时间顺序上是合理的。《后汉书·和帝本纪》有这样的记载:“永元九年(公元97年)春四月,永昌徼外蛮及掸国重译奉献。”《后汉书·顺帝本纪》:“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是侗台语民族从云南、广西分化迁徙出去、进而形成今天的中南半岛的侗台语民族的一个重要阶段。至于中国境内的其他侗台语民族的分化与形成,有关的记载在唐宋以后逐渐多了起来,到了明清两代,其脉络已经清晰可见了,像对壮族与布依、毛南、仡佬等族的记述,逐渐见诸文字。甚至有些是在解放后民族识别时才被人为的区分开来。另一点必须加以说明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有学者提出的壮侗语族可分为四个语支,也就是新构建了一个新的语支——仡央语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虽然它其它同一语族里的另外三个语支有较大的差异,却不意味着它与侗台语民族的分化的时间发生更早,而是因为与周边的其它非侗台语民族之间互动的结果。

五、结语

百越是个内部关系相对松散的民族集团,包含许多互不统属但又有着较为密切关系的支系。他们有着相同的地理环境背景,有相同的或者相近的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百越文化与中原的华夏文化相对独立地平行发展着。多种研究表明,从南岛语族的区域范围到亚洲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中南半岛相连而形成的广袤地区,具有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相同或者相似、语言文化相联系的背景,因而可以推断出在整个石器时代到文明时期的漫长时间里,以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华南一带为中心的百越人民逐渐向东南、西南方向进发,逐渐辐射至整个南岛语族的范围,在时间、文化融合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今天的南岛语族的情况,也就是“澳泰文化圈”。侗台语民族不仅作为百越的一个重要的支系,而且还是百越的最直接的继承者,从文化和地理位置上看,它在这个广泛的文化圈里处于核心的地位,是这个文化圈的发源地。

注释:

- ①范宏贵等译:《越南北方少数民族》,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译,1986年。②黄兴球、韦顺利:《中国南方民族历史文选》,广西民族出版社,2003年。③吴春明:《百越先民与南岛语族关系研究中的对话》,载于费君清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越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7-78页。④徐松石:《徐松石民族学著作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68页。⑤Peter Bellwood. 1991. The Austronesian Dispersal and the Origins of Languages. Scientific American, July: 88-93。⑥董恩正:《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68-69页。⑦李锦芳:《侗台语言与文化》,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页。⑧覃圣敏主编:《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第一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页。⑨Joachim Schliesinger: Ethnic Groups of Laos Volume 3, Profile of Austro-Thai-Speaking Peoples. White Lotus 2003。⑩胡绍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发展史》,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51页。⑪王文光:《中国南方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26页。⑫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9页。⑬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42页。⑭范宏贵:《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2004年,第214-214页。⑮张声震:《壮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144页。⑯梁庭望:《壮族文化概论》,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6页。⑰即广义上的壮侗语民族——作者注。⑱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8-21页。⑲倪大白:《侗台语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4页。⑳郑超雄:《广西工艺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5页。㉑郑超雄:《广西工艺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页。㉒《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页。㉓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㉔尼古拉斯·塔林:《剑桥东南亚史》,贺圣达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7页。㉕转引郑超雄:《广西工艺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5页。㉖董恩正:《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2004年,第1页。㉗《淮南子·原道训》。㉘《淮南子·齐俗训》。㉙罗兹·墨菲:《亚洲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第125页。㉚指侗台语族——作者注。㉛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9页。㉜范宏贵:《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23页。㉝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页。㉞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页。㉟《竹书纪年》及《吕氏春秋·音初》。㊱《史记·吴起列传》。㊲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8-21页。㊳范宏贵:《同根生的民族》,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53页。